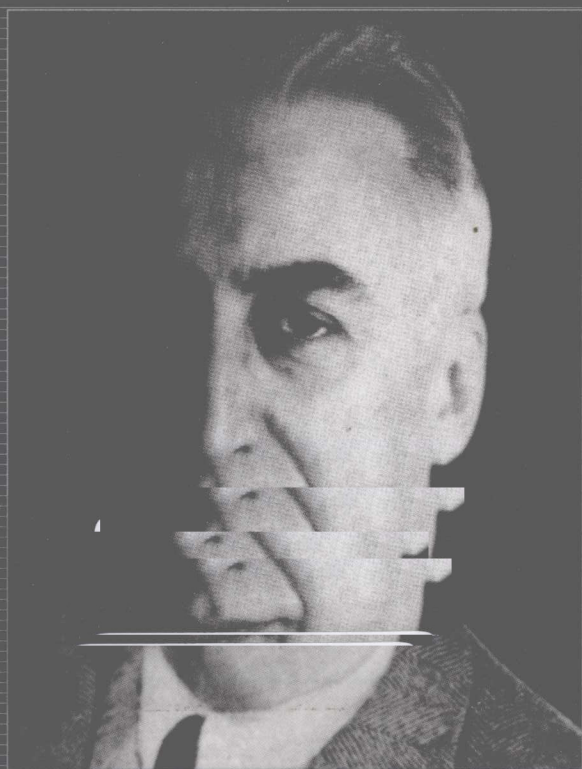


Roland Barthes
罗兰·巴尔特文集



Roland Barthes par Roland Bart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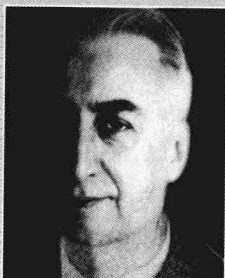
罗兰·巴尔特自述

[法] 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 著

怀宇/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oland Barthes 罗兰·巴尔特文集



Roland Barthes 罗兰·巴尔特 罗兰·巴尔特自述

[法]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 著

怀宇/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兰·巴尔特自述/[法] 罗兰·巴尔特著; 怀宇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罗兰·巴尔特文集)

ISBN 978-7-300-11757-7

I. ①罗…

II. ①巴…②怀…

III. ①巴尔特, R. (1915~1980) —自传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2553 号

罗兰·巴尔特文集

罗兰·巴尔特自述

[法] 罗兰·巴尔特 著

怀宇译

Luolan Ba'erte Zish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8mm×210mm 32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0.875 插页 3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1 00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罗兰·巴尔特（1915—1980）是已故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思想家和理论家，结构主义运动主要代表者之一，并被学界公认为法国文学符号学和法国新批评的创始人。其一生经历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媒体文化评论期（1947—1962）、高等研究院教学期（1962—1976）以及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期（1976—1980）。作者故世后留下了5卷本全集约6 000页和3卷本讲演录近千页。这7 000页的文稿，表现出了作者在文学、文化研究和人文科学诸领域内的卓越艺术品鉴力和理论想象力，因此可当之无愧为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想家之一。时至今日，在西方人文学内最称活跃的文学理论及批评领域，巴尔特的学术影响力

仍然是其他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难以企及的。

1980年春，当代法国两位文学理论大师罗兰·巴尔特和保罗·萨特于三周之内相继谢世，标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乃至西方两大文学思潮——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终结。4月中旬萨特出殡时，数万人随棺送行，场面壮观；而3月下旬巴尔特在居住地 Urt 小墓园下葬时，仅有百十位朋友学生送别（包括格雷马斯和福科）。两人都是福楼拜的热爱者和研究者，而彼此的文学实践方式非常不同，最后是萨特得以安息在巴黎著名的 Montparnasse 墓地内福楼拜墓穴附近。萨特是雅俗共赏的社会名流，巴尔特则仅能享誉学界。

1976年，巴尔特以其欠缺研究生资历的背景（据说20世纪50年代末列维-斯特劳斯还曾否定过巴尔特参加研究生论文计划的资格），在福科推荐下，得以破格进入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1977年1月，挽臂随其步入就职讲演大厅的是他的母亲。8个月后，与其厮守一生的母亲故世，巴尔特顿失精神依持。在一次伤不致死的车祸后，1980年，时当盛年的巴尔特，竟“自愿”随母而去，留下了有关其死前真实心迹和其未了（小说）写作遗愿之谜。去世前两个月，他刚完成其最后一部讲演稿文本《小说的准备》，这也是他交付法兰西学院及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作品。而他的第一本书《写作的零

度》，则是他结束6年疗养院读书生活后，对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屈辱的法国文坛所做的第一次“个人文学立场宣言”。这份文学宣言书是直接针对他所景仰的萨特同时期发表的另一份文学宣言书《什么是文学？》的。结果，30年间，没有进入过作为法国智慧资历象征的“高等师范学院”的巴尔特，却逐渐在文学学术思想界取代了萨特的影响力，后者不仅曾为“高师”哲学系高材生，并且日后成为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屈一指的哲学家。如今，萨特的社会知名度仍然远远大于巴尔特，而后的学术思想遗产的理论价值则明显超过了前者。不过应当说，两人各为20世纪文学思想留下了一份巨大的精神遗产。

如果说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我们不妨说罗兰·巴尔特是20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请参阅附论《罗兰·巴尔特：当代西方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欧洲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内容和形成条件变迁甚巨，“文学思想”的意涵也各有不同。文学之“思想”不再专指作品的内容（其价值和意义须参照时代文化和社会整体的演变来确定），而需特别指“文学性话语”之“构成机制”（形式结构）。对于20世纪特别是战后的环境而言，“文学实践”的重心或主体已大幅度地转移到批评和理论方面，“文学思想”从而进一步相关于文学实践和文学思想的环

境、条件和目的等方面。后者遂与文学的“形式”（能指）研究靠近，而与作为文学实践“材料”（素材）的内容（“所指”）研究疏远。而在当代西方一切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领域，处于文学科学派和文学哲学派中间，并处于理论探索和作品分析中间的罗兰·巴尔特文学符号学，遂具有最能代表当代“文学思想”的资格。巴尔特的文学结构主义的影响和意义，也就因此既不限于战后的法国，也不限于文学理论界，而可扩展至以广义“文学”为标志的一般西方思想界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选的这套“罗兰·巴尔特文集”，目前包括10卷12部作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罗兰·巴尔特文学思想的基本面貌。由于版权问题，出版社目前尚不能将他的其他一些重要作品一一收入。^① 关心巴尔特文学思想和理论的读者，当然可以参照国内其他巴尔特译著，以扩大对作者思想学术的更全面了解。此外，文集还精选了菲利普·罗歇（Philippe Roger）的著名巴尔特评传：《罗兰·巴尔特传》（1985），作为本文集的附卷。

现将文集目前所收卷目及中译者列示于下：

① 在“10卷12部作品”之后，已经获得版权的巴尔特作品有：《萨德·傅立叶·罗犹拉》（1971）、《明室》（1979）、《中国行日记》（1974）、《哀悼日记》（1977—1979）、《偶遇琐记·作家索莱尔斯》、《恋人絮语》（1974—1976），并有附卷《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Hervé Algalarrondo 著）。——编者注

1. 写作的零度 (1953) · 新文学批评论文集 (1972) · 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 (1977): 李幼蒸
 2. 米什莱 (1954): 张祖建
 3. 文艺批评文集 (1964): 张智庭 (怀宇)
 4. 埃菲尔铁塔 (1964): 李幼蒸
 5. 符号学原理 (1964): 李幼蒸
 6. 符号学历险 (1985): 李幼蒸
 7. 罗兰·巴尔特自述 (1976): 张智庭
 8. 如何共同生活 (讲演集 1) (2002): 张智庭
 9. 中性 (讲演集 2) (2002): 张祖建
 10. 小说的准备 (讲演集 3): 李幼蒸
- 附卷: 罗兰·巴尔特传: 张祖建

讲演集是在法国巴尔特专家埃里克·马蒂 (Eric Marty) 主持下根据作者的手写稿和录音带, 费时多年编辑而成的。这三部由讲演稿编成的著作与已经出版的 5 卷本全集中的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 翻译的难度也相对大一些。由于法文符号学和文学批评用语抽象, 不易安排法中术语的准确对译, 各位译者的理解和处理也就不尽相同, 所以这部文集的术语并不强求全部统一, 生僻语词则附以原文和适当说明。本文集大致涉及罗兰·巴尔特著作内容中以下五个主要方面: 文本理论、符号学理论、作品批评、文化批评、讲演集。关于各卷内容概要和背景介绍, 请参见各卷译者序或译后记。

在组织翻译这套文集时，出版社和译者曾多方设法邀约适当人选共同参与译事，但最后能够投入文集翻译工作的目前仅为我们三人。张智庭先生（笔名怀宇）和张祖建先生都是法语专家。张智庭先生为国内最早从事巴尔特研究和翻译的学者之一，且已有不少相关译作出版。早在1988年初的“京津地区符号学座谈会”上，张智庭先生对法国符号学的独到见解即已引起我的注意，其后他陆续出版了不少巴尔特译著。张祖建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法语文学系，后在美国获语言学博士学位，长期在法国和美国任教至今，并有多种理论性译著出版。我本人在法语修养上本来是最无资格处理文学性较强的翻译工作的，最后决定勉为其难，也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我固然希望有机会将自己的几篇巴尔特旧译纳入文集，但更为主要的动力则源自我本人多年来对作者理论和思想方式的偏爱。大约30年前，当我从一本包含20篇结构主义文章的选集中挑选了巴尔特的《历史的话语》这一篇译出以来，他的思想即成为我研究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主要“引线”之一。在比较熟悉哲学性理论话语之后，1977年下半年，我发现了将具体性和抽象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而结构主义之中，又以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最具有普遍的启示性意义。这种认知当然也与我那时开始研习电影符号学的经验有

关。我大约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同时将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和克里斯丁·麦茨、艾柯等人的电影符号学纳入我的研究视野的。1984年回国后,在进行预定的哲学本业著译计划的同时,我竟在学术出版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迫不及待地自行编选翻译了那本国内(包括港、澳、台)最早出版的巴尔特文学理论文集,虽然我明知他的思想方式不仅不易为当时长期与世界思想脱节的国内文学理论界主流所了解,也并不易为海外主要熟悉英美文学批评的中国学人所了解。结果两年来在多家出版社连续碰壁,拖延再三之后,才于198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要感谢当时刚设立的“世界与中国”丛书计划,该丛书还把我当时无法在电影界出版的一部电影符号学译文集收入)。这次在将几篇旧译纳入本文集时,也趁便对原先比较粗糙的译文进行了改进和订正。我之所以决定承担巴尔特最后之作《小说的准备》的译事工作,一方面是“从感情上”了结我和作者的一段(一相情愿的)“文字缘”,即有意承担下来他的第一部 and 最后一部书的译事,另一方面也想“参与体验”一段作者在母亲去世后心情极度灰暗的最后日子里所完成的最后一次“美学历程”。我自己虽然是“不可救药的”理性主义者,但文学趣味始终是兼及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这两个方向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之后决定出版另一位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的

文集，周蔚华总编、徐莉副总编、人文分社司马兰社长，表现了对新型人文理论的积极关注态度，令人欣慰。本文集策划编辑李颜女士在选题和编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判断和组织作用。责任编辑姜颖昶女士、翟江虹女士、李学伟先生等在审校稿件方面尽心负责，对于译文差误亦多所更正。对于出版社同仁这种热心支持学术出版的敬业精神，我和其他两位译者均表感佩。

最后，我在此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次约请我担任一部结构主义文集总序的撰写人一事表示谢意。这不仅是对我的学术工作的信任，也为我提供了再一次深入研习罗兰·巴尔特思想和理论的机会。巴尔特文学思想与我们的文学经验之间存在着多层次的距离。为了向读者多提供一些背景参考，我特撰写了“附论”一文载于书后，聊备有兴趣的读者参阅。评论不妥之处，尚期不吝教正。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2007年3月于美国旧金山湾区

译者序

《罗兰·巴尔特自述》是作者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写作和学术生涯第四阶段的代表作之一。

关于这本书的成因，巴尔特在接受采访时说，那是在色伊（Seuil）出版社组织的一次工作午餐会上，大家提议今后让作家们自己写书来评判自己的著述，并随后将其放进“永恒的作家”（Ecrivains de toujours）丛书之中。巴尔特本着这种精神，曾经想把书“写成插科打诨性的东西，写成某种我自己的仿制品”。但是，真正进入写作之后，“一切都变了，一些书写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显现出来，使得最初的简单想法变得极为滑稽可笑”（《全集》第三卷，315页）。于是，他认为应该利用提供给他的这

次机会，来阐述他与自己的形象，也就是与他的“想象物”之间的关系。而且，作者认为，这种自己写自己的做法正是“镜像阶段”中的主体与其自我的想象物即镜中形象的关系（见《退步》一节）。在译者看来，全书就是作者与其自我想象物之间的一种对话。全书经过了一年零 27 天的写作，于 1974 年 9 月 3 日脱稿，这样，巴尔特就成了这套丛书 100 多位作家中唯一在活着时就“永恒的作家”。

全书采用了片断的书写形式。按照作者的说法，一方面，他一直喜欢采用片断的书写方式，而对于长长的文章越来越无法忍受。另一方面，他必须采用一种形式来化解几乎要形成的“意义”。他认为，不应该由他来提供意义，“意义总是属于别人即读者”。于是，他决定使这本书成为以“分散的整体”出现的书，就像他所喜爱的具有“散落”叶片的棕榈树那样。显然，这两方面代表了巴尔特关于写作的主张。首先，综观巴尔特的全部著述，他除了专题著述（《论拉辛》、《服饰系统》、《S/Z》）之外，其余的书都是文章的汇编，而且即便是那几本专题著述，其内部结构也是零散的，有的甚至也是片断式的。巴尔特说过：“对于片断的喜爱由来已久，而这，在《罗兰·巴尔特自述》中得到了重新利用。在我写作专著和文章的时候（这一点我以前不曾发现），我注意到，我总是按照一种短的写作方式来写——在我生命中的一个阶段，我甚至只

写短文，而没有写成本的书。这种对短的形式喜爱，现在正在系统化。”（《全集》第三卷，318页）其实，他的第一篇文章（1942）就是以片断的形式写成的，“当时，这种选择被认定是纪德式的方式，‘因为更喜欢结构松散，而不喜欢走样的秩序’。从此，他实际上没有停止从事短篇的写作”（见本书《片断的圈子》一节）。其次，巴尔特坚持反对“多格扎”（doxa），即形成稳定意义的“日常舆论”，这也使他无法写作长篇大论。他说：“一种多格扎（一般的舆论）出现了，但是无法忍受；为了摆脱它，我假设一种悖论；随后，这种悖论开始得以确立，它自己也变成了新的成形之物、新的多格扎，而我又需要走向一种新的悖论”（见本书《多格扎与反多格扎》一节），“悖论是一种最强烈的令人着迷的东西”（见本书《作为享乐的悖论》一节）。他之所以这样做，而且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价值的波动”引起的：“一方面，价值在控制、在决定……另一方面，任何对立关系都是可疑的，意义在疲劳……价值（意义便与价值在一起）就这样波动，没有休止。”（见本书《价值的波动》一节）为了做到这样，片断写作“可以打碎我定名的成形观念、论述和话语，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人们按照对所说的内容要给予最终意义的想法来建构的——这正是以往世纪中整个修辞学的规则。与所建话语的成形状态相比，片断是一种可喜的打乱，即一种断

续，它确立句子、形象和思想的一种粉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它们最终都不能得以“完整确立”（《全集》第三卷，318页）。

此外，作者在书中主要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写法，有意拉开“叙述者”与“作者”本人的距离，这在自传体中也是少有的。把片断写作与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相结合，也有利于避免读者对作者产生“成形的”看法，即他一再反对的“多格扎”，足见作者为此是煞费了苦心。但是，“由于我过去的著述是一位随笔作家的著述，所以，我的想象物就是某种一时观念的想象物。总之，是某种智力的小说”（《全集》第三卷，335页）。这似乎告诉我们，虽然巴尔特在本书的开头就提醒人们：“这一切，均应被看成出自一位小说人物之口”，但由于他承认其“小说”是其“某种一时观念的想象物”，所以，它可以成为我们对巴尔特的思想进行某种推测和研究的依据。

那么，片断式写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审美效果呢？对此，巴尔特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他在《文本的快乐》一书中做过完整的总结：“阅读的快乐显然源自断裂……文化及其破坏都不具色情特点；是它们之间的断层变成了色情的”，“快乐所需要的，是一种出现损失的场所，是断层，是中断，是风蚀”，“人体最具色情意味之处，难道不就是衣饰微开的地方吗？……间断具有色情意味：在两种

物件（裤子与毛衣）之间、在两个边缘（半开的衬衣、手套和袖子）之间闪耀的皮肤的间断具有色情意味。正是闪耀本身在诱惑，或进一步说，是一种显现—消失的表现状态在诱惑”（《文本的快乐》，15、19页）。这不正是片断写作可以带来的效果吗？至于片断写作在本书中的情况，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片断的排列。巴尔特没有按照自己的生活年代或者写作阶段的顺序来排列相关片断，而是大体上按片断名称的第一个字母进行了排列，有时甚至还故意打乱这种排列。他自己这样说：“他大体上想得起他写作这些片断的顺序；但是，这种顺序出自何处呢？它依据何种分类、何种连接方式呢？这些他就想不起来了。”（见本书《我想不起顺序来了》一节）这样做的结果，使得翻译成汉字之后的排列更是杂乱无章，阅读起来使人大有时间错位、事件凌乱、没有贯穿的内在逻辑关系的感觉。但是，巴尔特却认为“杂乱无章，也是一种享乐空间”。色伊出版社1975年在出版本书时，封面上采用了巴尔特用彩色蜡笔绘制的在我们看来是“杂乱无章”的画《对于茹安-雷-潘镇的记忆》，也是很有寓意的。我们不妨说，巴尔特在片断写作方面的审美追求是系统化的。

巴尔特承认其“道德观”这一写作阶段是受了尼采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曾经满脑子装满了尼采，因为我在此前刚刚读过他的著

作”(见本书《何谓影响?》一节),“他在为‘道德观’(moralité)寻找定义。他把这个词与道德规范(morale)对了起来”(见本书《朋友们》一节)。但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接受了尼采思想的哪些方面。译者认为,我们似乎可以从他对尼采的总体了解来推断一下这种影响。尼采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通过对价值判断的解释来反对传统的价值,并主张人不是“完全实现的整体”,人具有总是更新的创造力,总是向着“他者”逃逸。而尼采对哲学进行解释的方式则是通过箴言和诗。所谓箴言即格言性的写作物,即片断。似乎可以说,尼采的哲学思想坚定了巴尔特不固守“多格扎”的主张,而其箴言式的解释方式无疑也是对“片断写作”的提前肯定。

我在我国驻法国大使馆工作期间,曾于1995年3月26日那天(巴尔特逝世15周年纪念日)在巴约纳市参加了由当地市政府举办的“纪念巴尔特国际研讨会”。我之所以被邀,是因为此前我翻译的《罗兰·巴特随笔选》刚刚在国内出版,是法国色伊出版社向会议主办单位推荐的。我是头一天下午赶到巴约纳市的,在旅馆稍作安顿之后,便出门随便走走,我特别想领略一下巴尔特在书中描写过的巴约纳市。巴约纳市西临大海,一条入海的河流穿城而过,城市不大,但建筑古老,颇有历史。我在距旅馆不远的海边广场上停了下来,